

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演变:国家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对比分析*

□ 冀县卿 黄季焜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地使用权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种政策变化在实践中有多大幅度得到贯彻执行,至今还没有做系统的比较分析。本文目的是从农地使用权期限、农地调整、农地确权、农民自主经营决策权以及农地转让权5个方面,揭示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差异,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农民土地使用的现实变迁与国家政策的演变方向基本一致,但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现实与政策还有一定差距。为此,本文认为加强既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在未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同等重要。

关键词:农地使用权;政策演变;政策执行;比较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稳定农地使用权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McMillan等,1989;Lin,1992;Huang等,1996)。1978—2008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6%,远高于人口年均1.1%的增长速度^①。Besley(1995)指出,稳定的产权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为此,稳定农地使用权及其绩效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如张红宇(2002)系统回顾了到20世纪末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姚洋(2000)和赵阳(2007)等认为,土地承包期的延长提高了农户对农地使用权的稳定性预期。俞海等(2003)和许庆等(2005)的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农地调整代表程度各异的农地使用权稳定性,并对农户产生不同的长期投资激励。冀县卿等(2010)和黄季焜等(2012)发现农地

使用权确权等提高农地使用权稳定性政策的加强和实施,提高了农户有机肥的施用量,进而有助于促进农业的长期增长。钱忠好(2002)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制度瓶颈,研究结果发现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对农户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

围绕农地使用权稳定性的政策变迁与落实情况,学术界也已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如张红宇(2002)和王燕燕(2010)等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使用权变迁的历程。叶剑平等(2006、2010)则对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也有的研究就农地使用权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政策与现实执行情况的对比,例如,陶然等(2009)对二轮承包后农村土地调整的政策与现实状况进行了研究。

* 项目来源: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103156)、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课题(编号:CIRS2012-2)、农业部软科学课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号:2012ZD2008)、中国博士后基金(编号:2011M500368)和江苏省“青蓝工程”等项目资助。感谢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2000年和2009年两次大规模调查的所有调查成员以及CCAP的同事和同学,特别是张林秀、智华勇、郜亮亮、黄珠容和邓衡山等。感谢张红宇、Scott Rozelle、Loren Brandt、金松青和Alan deBrauw等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黄季焜为本文通讯作者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但是就目前的文献来看,系统地在同一框架内、运用相同地点、长期跟踪农户的面板数据分析和对比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变与实际执行情况的研究尚不多见。因而,将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样本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梳理改革

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进、了解各项国家政策在实践中的实际执行情况,分析它们与政策要求之间的差异,这对总结过去经验和判断未来的农地使用权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和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政策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变

中国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一直沿着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方向演变。具体而言,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增强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的变化上:

(一) 农地使用权期限

农地使用权期限由最初的无明确年限延长到国家政策强调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家庭承包责任制推广初期,对承包期限并没有规定;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规定了15年的承包期;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又把新一轮的承包期延长到30年,这一规定写入了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二) 农地调整

中央政府对农村土地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逐步添加限制条件的政策。1997年之前,无论是“大稳定/小调整”政策,还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政策都开始逐步限制农地调整,但一些情况下仍然允许农地的大调整和小调整。1997年《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是一个转折点,其强调,“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了除特殊情况下个别农户可以进行有限的农地小调整外,不允许重新调整农地。

(三) 农地使用权确权

国家逐步强调确权颁证,以落实、明确并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分田到户初始虽然已规

定集体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合同随意性较大。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要求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要求向农民签发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确定土地承包关系。从2007年开始,更进入强调落实确权颁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阶段。

(四) 农民农地自主经营权

国家政策从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到充分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方向演变。1982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为了保证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协调与统一,社员承包的土地,必须依照合同规定,在集体统一计划安排下,从事生产。”1985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要求发包方须“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 农地转让权

国家政策发生了从严格限制农地流转允许农民可以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其土地使用权的变迁。土地承包初期,土地流转是不允许的,1982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但从1984年开始,政府逐步鼓励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当年的中央1号文件规定,“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把农地转让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给予保护。2002年以后,关于农户农地转让权的具体内容,如流转主体的权利义务、流转方式以及流转收益的归属等,都有了详细的规定。

三、抽样方法与数据

为系统评估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简称为CCAP,下同)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状况于2000年11月进行了基本上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第一次大规模入户调查,并于2009年4月对2000年第一轮调查的农户进行了追踪调查^①。

2000年,CCAP在对农地使用权稳定性进行调查时,采用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确定样本省。调查省份的选择代表了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域的6个省份,即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省和浙江省、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和湖北省、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和四川省。其次,确定样本县。将每个样本省的所有县按照人均工业总产值分成5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1个样本县,共

抽取30个样本县。再次,确定样本村和样本农户。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2个村,分别代表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和较低的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20个农户;共计60个样本村、1200个样本农户。在2000年抽样调查的1200个农户中,数据处理时,去除丢失和录入错误的11户样本后,得到1189户有效样本。2009年初,调查人员试图回访2000年调查的所有农户,经过艰苦的努力,获得了1071户有效样本。丢失118个样本的原因主要有:第一,2008年汶川地震导致无法对四川省的两个村进行跟踪调查;第二,一些2000年调查的农户2009年已经不在本村生活,多数是全家搬走或家人都在外面打工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等;第三,部分老年户在2000—2009年因逝世而不存在。

四、1978—2008年农地使用权现实及与政策对比

(一) 农地使用权期限

调查发现,随着土地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农地使用权期限与政策规定相符。在调查中,通过详细询问样本村第一次承包到户的时间和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间,间接地反映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变

迁。由表1可见,截至1984年,97%的调研样本村完成了第一次分田到户的工作。截至1999年,97%的村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2008年,所有被调查村都实施了二轮承包,农户的农地使用权期限得到了延长。

表1 第一次分田到户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年份及村庄数^a和比例(个,%)

分田到户年份及村庄数和比例			第二轮承包实际年份及村庄数和比例		
第一次承包到户年份	村庄数	村庄数比例	第二轮承包实际年份	村庄数	村庄数比例
1979	2	3	1994	3	5
1980	3	5	1995	2	3
1981	9	16	1996	2	3
1982	22	38	1997	20	35
1983	15	26	1998	14	24
1984	5	9	1999	15	26
1985	2	3	2000	2	3

注: a 表示村数为58个

(二) 农地调整

农村土地调整可分为大调整和小调整两类。农地大调整指无论承包是否到期,集体将全部承包地打乱重新分配给农户;小调整则指在个别农户之

间调整分配土地。调查发现,分田到户以来一直存在农地大小调整现象,但2000年以来,发生农地调整村的比例明显减少(见图1),这可能与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对农地

^① 本文后续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全部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这两轮调查

调整的严格限制有关。

1982—2008年,农地大调整经历由波动增加到绝对减少再到停止调整的过程。1982—1996年平均进行过调整的村所占的比例为6%*,1997—1999年这一比例则高达11%,2000—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1%,实际上从2006年以来农地大调整就不再发生了。

1982—2008年,农地小调整经历由波动增加到绝对减少的过程。1982—1996年平均进行过小调整的村所占的比例为15%,1997—1999年这一比例则高达32%,2000—2008年这一比例降低至7%。二轮土地承包以来,虽然样本村发生过农地小调整的比例明显降低,但直到2008年农地小调整依然存在,这与国家相关政策没有对农地小调整进行绝对限制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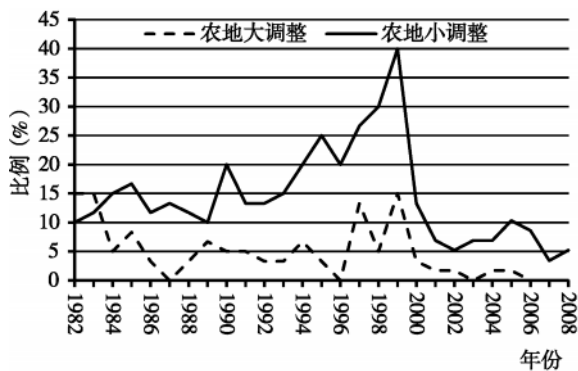


图1 1982—2008年农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村所占比例

可见,虽然农地调整趋势变化同各期政策出台比较一致,各项控制农地调整的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各地农地调整的实际情况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定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农地大调整方面,国家政策在1997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就开始严格禁止农地大调整,而实际调查表明直到2006年才开始停止农地大调整,相差近十年的时间。

(三) 农地使用权确权

对农地使用权确权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土地

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比例不高(见表2)。在受调查的农户中,仅持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户比例为17%,仅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比例为14%,两者都持有的农户比例刚刚过半数,为51%。此外,仍有18%的农户既未持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未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图2显示,1999年和2005年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两个高峰时点。1999年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第一个高峰时点,这可能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有关。2005年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另一个高峰时点,这可能与2002年开始的国家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的力度加大有关。

表2 2008年农户持有土地合同和证书的情况
(n=1093)

项目	样本数(户)	比例(%)
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户	181	17
仅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	158	14
两者都持有的农户	554	51
两者都未持有的农户	200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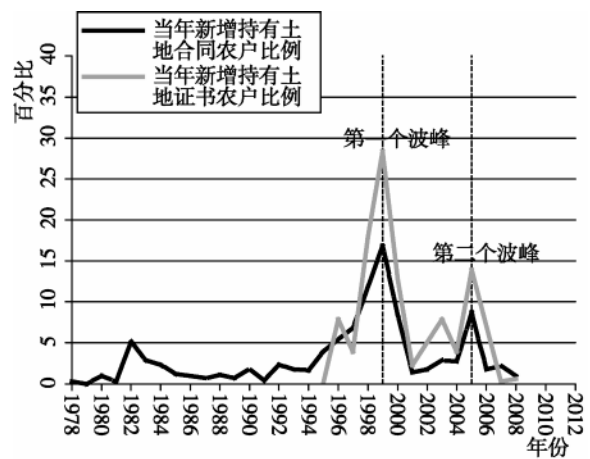


图2 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时间的分布情况

* 将1982—2008年分为3个时期是因为1997—1999年这一时期同其之前的1982—1996年和之后的2000—2008年有所不同。1997—1999年是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即“三十年不变政策”落实的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大致是各地进行农地调整的高峰期。如杨学成等(2001)等的调查也发现,大规模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真正从1998年开始,截至1999年12月底有86.6%的村开始了“三十年不变政策”的工作

综上所述,农户同时持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比例刚刚过半数,这与2007年农业部等部门颁布《关于开展全国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户率2007年底达到90%以上”的要求相差甚远。

(四) 农民农地自主经营权

调查表明,与政策一致,农民已经有完全独

立的农地自主经营权(见表3)。1995年,91.7%的农户可以自行决定种植的作物品种,这一比例在2000年上升到98.3%,截至2008年,全部的农户都可以自行决定种植作物品种,这与国家政策强调尊重农民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吻合。

表3 1995—2008年农户自主经营权变迁情况 (%)

可以自行决定			可以,但须征得村里同意			不可以,得由村里说了算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91.7	98.3	100	5.0	1.7	0	3.3	0	0

(五) 农地转让权

为了解农地转让权问题,调查人员分别走访了村委会书记、主任等村干部和农户。调查结果总结如下:

1. 村干部的调查结果。对村干部的调查发现,到2008年农户基本可以依法自主决定流转自己的土地,但村内流转和村外流转时自行决定权的程度略有不同(见表4)。1995年、2000年和2008年,农户可以自行决定在村内流转土地的比例分别为75%、82%和97%;到2008年,只有3%的村农

户在村内流转农地时需要征得村干部同意。

当农户的土地流转到村外其他人时,虽然需要村干部同意的村也不断减少,但到2008年还有约1/5的村要么需要村干部批准要么不允许流转。表4表明,农户可以自行决定将土地转给外村村民的比例由1995年的65%提高到2008年的79%。但调查结果也表明,到2008年,有16%的村在土地流转到村外其他人时需要征得村干部同意,还有5%的村不允许土地转给外村村民。

表4 农户土地流转范围(1995—2008年) (%)

范围	可以自行决定			可以,但须征得村干部同意			不可以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村内流转	75	82	97	17	17	3	8	1	0
村外流转	65	68	79	8	7	16	27	25	5

2. 农户的调查结果。对农户的调查表明,他们对土地的转让、转包权利的认知度较高,基本领会了国家的政策。由表5可见,55%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其中47%的农户认为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是否转让土地,8%的农户认为需经过村干部批准或通知村干部后才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84%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可以转包自己的土地,其中77%的农户认为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土地是否转包,7%的农户认为要经过村干部批准或通知村干部后才可以转包自己的土地。30%的农户认为不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认为不可以转包自己土地的农户比例则较低,只有5%。还有

15%和11%的农户不知道自己拥有转让、转包自己土地的权利。

表5 2009年农户对自家的土地是否可以转让、转包的认知 (个,%)

选项	转让		转包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可以	585	55	897	84
其中:可以,自行决定	501	47	821	77
可以,但需得到村干部的批准	64	6	49	5
可以,但需要通知村干部	20	2	27	2
不可以	325	30	49	5
不知道	159	15	123	11
合计	1069	100	1069	100

可见,对村干部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农户基本可以依法流转自己的土地,但村内流转和村外流转略有不同;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户对其土地的转让、转包权利的认知度较高,基本理解了国家政策的变动趋势。但在个别地区和村庄,目前农户在

土地向村外流转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方式的规定有些差距。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制度从总体上看是朝着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方向演变。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变迁与国家政策的演变方向基本保持一致,农民已经有完全独立的农地自主经营权,但是研究也发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现实状况与政策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虽然这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的法规和政策体系下,加强既定的包括农地使用权在内的农地政策的

执行力度,其和未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同等重要。同时,改进现有农村土地法规和政策,积极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试点工作,主要包括,改30年农地承包使用权政策为99年或永久承包使用权政策,进一步提高农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在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础上,允许农地进行抵押,允许土地使用权证的买卖,充分发挥土地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参考文献

1.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 Lijing Zhu.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4): 781 ~ 807
2.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 34 ~ 51
3. Jikun Huang, Scott Rozelle.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49(2): 337 ~ 369
4. Timothy Besley.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5): 903 ~ 937
5. 张红宇.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6.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 ~ 65
7. 赵阳. 共有与私用: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8. 俞海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土地资源持续利用. *经济研究*, 2003(9): 82 ~ 91
9. 许庆章, 元.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 *经济研究*, 2005(10): 59 ~ 69
10. 冀县卿, 钱忠好. 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 基于农地产权结构视角的分析. *管理世界*, 2010(11): 68 ~ 75
11. 黄季焜, 冀县卿. 农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 *管理世界*, 2012(9): 76 ~ 81
12.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 理论与政策分析. *管理世界*, 2002(6): 35 ~ 45
13. 王燕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回顾与展望.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80 ~ 84
14. 叶剑平等. 2005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 17省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 *管理世界*, 2006(7): 83 ~ 93
15. 叶剑平等. 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 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 *管理世界*, 2010(1): 72 ~ 81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 吕新业

MAIN CONTENTS

Changing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o Create the New Growth of Food Production: Some Thoughts on China's Grain after the "Nine Year's Continually Output Increase" ... *YE Zhenqin*(4)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Mode of Large-scale Grain Operation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Zhong He" Mode in Hebi City ,Henan Province *JIANG Heping and JIANG Hui*(10)

Xun County in Hebi City ,Henan Province has explored the way that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e moderate large-scale operation. Based on the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based on "legal ,voluntary ,and paid-rights" ,they make the enterprises and households be "win-win " ,and fundamentally relieve the land circulation farmers' worries. The bold attempt of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through government's guidance ,the enterprises' operati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s useful kind of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for grain large-scale operation. In addition ,some experiences hav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othe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 Review on Structural Changes of China's Food Demand *LV Jie ,YU Zhonghua and ZHAO Yang*(15)

As a cruciall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he food issue matters most to approximately all aspects of one country. After a detailed and through review of researches by previous scholars ,we can grasp a better comprehension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food demand's structure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us enabling us better prepare for any possible food crisis.

Land Market Refor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haracter Analysis *QIAN Zhonghao and MU Yan*(20)

Based on combing the historical tracks since 1978 ,the character of the land market reform in China was analyzed by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were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nd market reform was the result of parties mutual game around external profit in certa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generated of external profits wer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land market reform appeared significant path dependent properties. The market mechanism is playing a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Every reform was related institutions' adjustment in the margin. It developed along the direction ,which can promote the level of land market. Speeding up the land market reform is Chinese government's inevitable choice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reform.

Evolution of Farm Land Use Rights during Thirty Years of Reform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etween 1978 and 2008 *JI Xianqing and HUANG Jikun*(27)

The policies of farmland use right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ly changes since the reform initiated in rural China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literature on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s of the gaps between the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s in the areas of land reallocation ,verifying land use rights ,rights for renting out ,and farmer's management righ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olicy reform. Based on a unique dataset from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survey ,while we found that the real changes of farmland use rights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ies ,we also found the evidences of lacking of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Ensuring stability of farmland use

rights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 We conclude that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of existed policy and deepen reform of farmland institution in the futu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Efficacy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f Self-governance When the Institutions Are Given PEI Zhijun(3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villager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efficacy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f self-government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to the re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f Self-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efficacy have relatively specific effects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f self-government and verif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study tentatively expounds the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 of role ,which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efficacy have played to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f self-governance. Theoretically ,the study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and practically ,the study could offer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the Example of Rural Road CHEN Dongping and WANG Haiyuan(44)

Based on cross-section data from rural China ,this paper explo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 investment. Using data from 74 villages and 728 household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normative degree of electoral procedur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 In addition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has an inverse-U-shap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We also found i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if the government designated the construction side ,while farmer participation factor has a positive effect.

Coordin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ongqing Provice HUANG Chengwei and QIN Zhimin(51)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hinking about the Expenditure-over-income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Example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ce ZHOU Runshu and CHENG Shouhong(56)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from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region -Dongguan ,which is strong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reasons of the expenditure-over-income i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are not only rooted in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ifficulty of revenue ,but also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conomic squeeze and political squeeze behalf of the plight of social. On this basi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mprove the financial ability to pay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make it clear collective economic role ,the role and function is firmly positioned in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strength and cut off the unlimited liability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reduce public services spending ,strengthen the budget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inhibit the squeez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rowding ,reform the existing rural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to prevent political squeeze behalf.

Studies on Credit Financing Mechanism in Specialized Farmer Cooperativ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WEI Keyou(62)

In the traditional credit extension loan pattern ,because of market governance structure don't mismatching with transaction attribute and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Those caus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credit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In the new classical contract relationship Supply chain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coul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s well as improve credit ability and establish debt